

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

杜维明 王 杰

(北京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87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形成一种建设性力量的新尝试。一方面,马克思人文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的相互配合,可以开拓一个崭新的人文视域,更好地指导现世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另一方面,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需要我们重新了解、辩证分析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即回到轴心文明、恢复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过程。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自由,在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人

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一个健康的历史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社会的重新焕发,无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辩难与思考问题,从而树立起悲剧意识。这是一种深刻的、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可见,面对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对于悲剧观念的关注可以使更好地反省现实,进而找到伦理、正义以及经验的合理性。在浓厚的历史记忆的积淀之下,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每一个主体人都有一个丰富而悲剧的人生,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类全体而奋斗,这也就将个体人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全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交流与对话,不仅是文化上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在精神世界中塑造个人与民族的方向,它面向的是未来,并关系到我们拥有怎样的未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儒学 人文主义 悲剧观念 未来

[作者简介]杜维明(1940—),男,云南省昆明市人,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

王 杰(1957—),男,江苏省无锡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8-0005-07

王杰:今天是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你昨天的演讲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

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用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王杰:对,现在是我们重新思考与人道主义、与人性相关的许多问题的时候了。

杜维明:的确如此,就像安德森他们对此也极为关注。先不说宗教,因为宗教是有争议的,但是精神性或者宗教性应该没有争议。意思就是说现在兴起来的马克思人文主义和儒家的人文主义能够配合,就是要超越启蒙哲学一直发展下来的这样一种凡俗的、反宗教的、反精神价值的、过度功利、过度物质化、对自然有过度的侵略、而且过度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受到西方很多杰出思想家,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社群伦理、文化多样、宗教多元等学者的批判。他们尝试一种新的人文视域,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和地球必须设法建立的一种新的关系。关爱地球,成为所有宗教传统的共识。就基督教而言,你不能说未来的天国比现在,也就是凯撒的世界,更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怀,因为你必须要在凯撒的世界里面改变你自己。就佛教徒来说,不能说净土和彼岸更重要,佛教徒必须要入世而转世,所以一般来讲,中国讲的佛教徒就是人生佛教(大虚)、人间佛教(印顺)乃至人间净土(星云、圣严和证严)。我觉得儒家在这方面和马克思的思想有很能够配合的地方。也就是说,儒家基本上说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就是在这个世间里。那么马克思的所说的社会实践,就是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做一个彻底的、批判性的解构。所以,他

主要的意思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去反映,而是要去改变。

王杰: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就是要去改变世界。

杜维明:儒家讲“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这个“为”wèi,后来被荀子讲得更极端一点,就是在今天会引起误会的“伪”wéi,即“为之”,“为”就是要由人来塑造、人来创造,所以在这个精神上,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有很多近似和交融的地方。

王杰: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我也觉得很兴奋。我们的论坛去年在曼彻斯特讨论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我们当时主要着眼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也讨论了马尔库塞、朗西埃等人的美学思想,但是对于“当下性”,去年讨论得并不多。应该说,在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是在去年的话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的。

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和当代的世界,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可能这还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核心价值观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之下,受到“文革”的影响,比如说“文革”过后,国内学术界对《手稿》的讨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分歧。关于“两个马克思”的问题,即“青年马克思”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其实受阿尔都塞学派的影响很大。这个消极的方面可能是过重了,也就等于说是误解了马克思,我本人觉得也没有真正地理解阿尔都塞,其实阿尔都塞还是有所指的。当然,阿尔都塞本身也有偏颇的地方。

杜维明:阿尔都塞作为一个人而言,也就是从儒家修身哲学或希腊精神磨炼的角度来观察,他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有的地方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里面有严重的暴力问题。就中国的经验来说,我基本上认为,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斗争、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要有的。因此,进行得越全面、越彻底,就越能够把不合理的现象弄清楚越好。可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斗争或者说竞争,必须摆在一种更宽广的、合作关爱的信仰之上。所以我觉得,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很多地方有着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乃至所谓受人文思

潮激发的存在感受,那么,就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来说,当然我的这个研究是很片面的,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宗教观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而是列宁的,而列宁对宗教是没有任何正面的肯定的。

王杰:马克思对宗教实际上是有正面肯定的。

杜维明:不仅如此,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说他不懂宗教是不可能的,他有他的宗教的敏感度。但列宁所代表的是一个没有宗教情怀的革命理想,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是大家现在批评得非常厉害的一个概念,所谓“State of Marxism”,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如果讲得再具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有这一面向,它一方面是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但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通过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所代表的精神,它有许多负面的因素,站在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大半都属于“土改”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阶段做详细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王杰:“土改”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人文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在重新研究那一段的历史,他们是从基层组织的档案收集入手的。

杜维明:不仅有很多问题,大概案例是超出上千了。比如说,有一位专门从事土改研究的法国学者,卢西恩·比安科(Lucian Bianco),他是一位严格的扎根具体事实分析的杰出学者,他认为土改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仅是不必要的,很多都是地痞流氓把原来相对和谐的社会整个破坏掉了。

王杰:对,很多乡绅等等都受到影响,其实他们当时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底层的某种社会力量,包含着许多正面的东西。

杜维明:的确,我认为这是完全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它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对它的负面,我们要摒弃。所以说,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思想上最伟大的发展就是彻底放弃斗争哲学那个阴暗面。一直以来,从斗争哲学到发展观,我们说是可以的,甚至到现在提出和谐。和谐的意思就是: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过分的物质化、商品化、过分的狭隘的一种功利的思想,都要

被重新转化,这就要把中国传统最深厚的那个文化,还有它以前能够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等这些力量,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中华民族自我救赎必须要经历的。

王杰: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现在,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是如你刚刚所讲,是有偏颇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

杜维明:可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方法,整个启蒙不仅是一个心态,一个运动,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计划。关于启蒙心态的问题,我和衣俊卿曾做过讨论,发表在《求实》杂志。他治学严谨,有深入探讨理论的热忱,但我认为他过分认同启蒙心态,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中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半都是完全认同启蒙的,可是这就存在一个对于启蒙的负面怎么批判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启蒙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有非常强烈的浮士德的征服自然的心态,它突出理性、自由、权利、法治等核心普世价值,但对同情、慈悲、正义、责任、和谐等核心价值,一般说是扎根亚洲的普世价值则掉以轻心了。对于这些课题,一个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启蒙心态的人要有所自觉。因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问题中呢,严格地说,从“文革”以来,那些残害的人、那些真正应该被绳之以法甚至要治罪的人,他自己有极大的话语权,有了权威性,但没有任何的自责自疚。而那些被残害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受教育非常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算是被牺牲的人,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一直到今天,那些“整人”的人气焰仍然很盛,“被整”的人不仅没有感觉到需要绳之以法或者诉诸正义,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责自咎并不合情合理。在这点上我觉得,需要做什么呢,讲起来又是政治不正确。我们要学南非,结束种族歧视以后,由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Mpilo Tutu)提出一个叫做“True and Deconciliation”,真理和饶恕、宽恕或者是解脱、解救的口号。那么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首先要将从“文革”以来、甚至更早以前,真正的社会上的不公平、残忍的阴暗面,把真理,完全地公诸于世,让大家都知道。用林肯的话讲,我们对任何人都是仁慈的,我们不是要用这些例子

来整人的,黑暗的时代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是,即使你再糟,只要你把事实讲出来,也有你生存的空间,而且有你的人格尊严。但前提这个事情要摆出来,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们一天到晚骂日本人,说他们不能反思什么,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人性,也都应该重新反思。

王杰:对土改、对“文革”都应该放在现在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反思。

杜维明:不能忘记! 对于一个民族,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自由,更不要说是还能够发展。我们现在气很不顺的时候,应该做些工作把我们的气弄顺,在这个时候,不是经济、政治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要去文化来解决,要去医治在文化上面终极关怀的一些最深刻的心灵的沧桑。一个现在 80 岁或者 90 岁的人,他的心灵的沧桑若不被医治,那他在临死的时候那种忿恨不平之气是不会消解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这样,而且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更是如此。更难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有古有今,而且历史记忆最长的、记录资料最全面的民族之一。

王杰:是的,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但是一直延续下来,保有最完整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的。

杜维明:可是现在却患了健忘症,忘却、主动的忘却,一个民族落成现在这种程度很窝囊。

王杰:我觉得这是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真的很有意思,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的学者与像你这样的对中国文化有很精深的研究的学者来进行对话。我想,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焕发出来,这个太重要了,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很难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我举一个例子,德里克是很著名的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关于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他曾给我写过邮件,说他还是有顾虑的。他觉得如果他来参加会议,会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批判,这样可能会不方便,所以他最后就没有来。我就在想,在今天这个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在当代去发展,怎样面对当代的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等等。

杜维明:这一点太重要了!

王杰:因为就批判性的这个维度而言,我们一讲批判性,就讲革命、讲革资本主义的命,却没有讲过对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经历中,哪些地方是极“左”的,哪些地方是有偏颇的等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杜维明:完全绕不过去。而且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于马克思的人道精神,所谓社会主义的异化这些问题,在 80 年代提出过,结果挨批得多惨。也想想那个时候,汝信,还有王元化、王若水都参加过这一工作。那时提出的观点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假如你不去谈,你看现在最高领导都公开,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把贪污腐化,包括异化,不把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加以重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还有在网上,只要发表言论,都是一种愤恨不平的迹象,没有真正能够静下来进行理性的辩难和思考问题。

王杰:其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文化,这样的心态很不好,很不利。

杜维明:很不利。不仅如此,对于有些区域来说,它们支持我们,因为它们的存在是要靠我们的。比如香港,对香港、港人一般的态度而言,你会说好,但是还存在一些很极端的、反一切权威的思想,这对整个港人和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的。现在说两岸的关系很好,但是马英九碰到的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无法绕过去的关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很短时间解决的。再比如说,和日本,和美国,和周边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之间,如果你要讲你自己国家的主权,人家也要讲人家的主权,一寸土你不要放弃,人家也一寸土不要放弃。在这个处境里,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应该有处理这种国际关系中微妙问题的能力。“以大事小,以仁爱;以小事大,以智慧”,可现在我们又不仁又不智。今天,对于比我们弱小的,我们打压了;对于比我们强的,我们不仅没有处理好正常关系,反而经常去挑衅,使得现在他们对我们的不安全感更强了,这是一条中国要走的路吗?

另外一点而言,我们并没有一个模式。不要说我们走出了一条模式,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模式,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有的是一种经验。我们的经验有好有坏,而且往前看,这条路

要走出来是极困难的。在经济上能走出一条路来吗,能够让其他的金砖四国学习吗?在政治上我们有一条路吗?在文化上,或者说,我们现在并不是大国,我们文化上的力量太薄弱了。此外,我们所考虑的价值领域太稀少了,除了政治、经济以外,我们在其他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哲学没有发言权,文学没有发言权,曾经多么辉煌的历史,一个那么伟大的民族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可以说,我也觉得有一点悲伤吧。所以就心情而言,我们应该有一种悲愤,这算忧患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不要说学术站不起来,你的国家民族也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要透视,要关怀,要去研究。同样,从事儒学研究的这批人,必须要了解到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些可以和我们合作的那些空间怎么开发。双方都要对中国的现实进行非常严厉而全面的批判的认识与反思。这本来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不努力培养基本功怎么行呢。

王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我在美学领域所涉及到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洛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王杰:其实儒家也有很深刻的悲剧意识。

杜维明:你从最深刻的这样一种悲患意识来看,古典的希腊悲剧,就是说你越有智慧、你越了解现实、你越能够有勇气面对现实,你就越悲惨。比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这些都是他的智慧、他的修身、他的磨炼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命中就是这样,这不是儒家的悲剧。儒家的悲剧更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和我们日常生活相联系。

就任何理想而言,特别是人的理想,人的理想就是要做圣人,而圣人就是最能够体现“仁”,也就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这种人通过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精神从和谐的家庭、正义的社会、安康的国家一直到天下大同。这个圣人的理想在现实的摸索过程中,一直在指导我们,要我们向前面超升,但是在每一步都受到限制的。可以这样说,像基督教,道成肉身,当肉身出现,它是具体的,道就受到限制、受到扭曲、甚至受到异化。所以当理想落实为具体行为必然会有张力、异化乃至冲突,孔子的存在选择是“鸟兽不可与同群”,他要进入世间来,他没有一个未来的天国,他也没有上帝、没有乌托邦的理念,他所选择和面对的就是在现实,他每天碰到的都是人的生活世界,其中当然有悲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想要做、我知道自己能够做的和我实际做的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扩大。当你有能量要发挥的时候,你却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因为色、或者是因为斗、或者是因为得,使你无法随心所欲。而当你有了智慧,你会理解到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不够了。我们把这叫做一个人的知性的缺失和感性的充沛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生的悲剧。

人就是这样,尽管我们没有轮回。严格说来,不管你的人生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你只有一生。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背负的就是“仁”,每一个人的“仁”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人体现的“仁”就是整个人类整体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够做到那么一点,人类的仁就会上升,而消除了就会下降,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感,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都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层层限定、层层破除限定

的奋斗之中,这里边都是悲剧。

比如说两个人,如果说是男女之情,那么男女之情完全能相悦、完全能融合无间其实很难。对于两个知己来说也很难,这是两个人之间。那么如果说家庭中有三五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就是说,真正到一种磨合得最好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古典的儒家的悲剧就是孟子讲的舜的故事,舜的父亲是一个残忍的人,舜的后母也对他极不友善,他的继弟还要抢他的财产,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最坏的家庭里,他居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和谐,这个人了不起,所以他的孝能感动天地,这个就是例外的例外。也许中华民族就出现这样一个人,所以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应敬佩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悲剧的意识不是希腊的悲剧意识,是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杰: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悲剧意识。

杜维明:如果说一个读书人,就是在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一批人,先不说精英不精英,事实上就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恒产也无恒心的,既没有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不会有更高的道德。但是有一批人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他有自觉、有先知先觉。这一批人数量很少,但文明的进步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他们有主体性,他们的主体性就是立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在奋斗,这个就是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仁人志士太多了,你看共产革命里面那些了不起的、重要的人物,悲剧下场的太多了,他们都有强烈的主体性。第二,这个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社群或阶级而是为了人类全体——不仅是中国人的全体,而是人类全体,所以才有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情况下面,就算是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再次,他有非常深刻和浓厚的历史记忆。孟子,孔子,孔子以前还有周公,周公以前还有尧、舜、禹,我们这个民族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了,到了孟子更是,他的历史意识很强,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同时,他还有非常强的天道观念。先不说是替天行道,孔子主要认同的一个是文王,一个是周公。如果“文”是被坠于地的,那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即使他如此我还是要作,这是我的责任。孟子“舍我其谁”,至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力量。我们在不同

环境、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最后,它面向的是未来。它绝不会为了目前,而是为了千秋万世,所以才有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

这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马有两大缺乏。首先,他没有注意到世界的问题,也没什么生态概念。其次,没有注意到精神世界也就是宗教的问题,或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够。认为物质世界改变以后,精神世界的基础结构就改变了,这在现在基本上是站不住了。先不说韦伯的批评,用以前毛泽东所讲的话,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意识就是价值优先的问题,我们人可以自足,价值优先是塑造一个个人和民族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性我们现在没有,可是这个方向性非定不可。这关系到未来和怎样的未来。我有这样一个比喻:拿火车轨道和火车头的关系来说,经济是火车头,火车头的动力极大。在“文革”的时候,全部力量摆在政治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那么现在改革开放拼命在搞经济,结果现在我们变成市场社会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面向了公共空间的理想,为公民社会及民主建构等大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王杰:其实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经历中也涉及到悲剧,但是就如你刚刚所讲,他还是比较关注革命意义上的悲剧。所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里用的是“革命悲剧”这个概念。他把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种模式,然后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另一种模式,并没有从人生的价值意义这个层面来讲,也许这是不够的。

杜维明:这是不够的。如果从孟学讲起,第一,你要有身心性命之学。这个不仅马克思没有,康德也没有。康德在定然命题的时候,他没有身心性命之学。当然牟宗三后来用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他没有对“智的直觉”,这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在康德的整个思想里面,他都没有办法为人性建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海德格尔对他的批评是对的。我们怎么知——认识论,怎么行——伦理学,怎么希望——神学,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何为人”的问题,对于“何为人”的问题,康德照顾得太不够了。他没有深度心理学,因此神学上的

研究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认为神学不可能在上帝存在或者灵魂永灭的方面来建立它的独立性,它只能说是道德律令的独立性,这是他的了不起的大贡献,对于“何为人”的问题也许是西方的艺术作了讨论,但是这一方面他并没有讨论。当然,海德格尔是有的,然后是存在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

就像我们这次会议上特别讨论到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但如果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些人都是比较软性的,首先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够深刻、不够彻底、不能转化现在这种大的问题,这是绝对不够。其实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都是我很欣赏的人物,可是却不行。因为首先你要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历史记忆和一个轴心文明经过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资源,印度有,犹太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有,中国也有,这就要求我们要回到轴心文明。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来看,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很多地方可能比韦伯更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这个工作很艰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遇见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看过《四书》,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样,一个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却不知道《共产党宣言》,对《资本论》一

窍不通,这也是不行的,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所以这是一个大考验。

就我们这个合作而言,大家都需要了解的是,人文学,特别是整个哲学在中国彻底边缘化了。当你走进一所大学,你不晓得要走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人文学院;在人文学院中,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哲学系。我举个例子,北大一个很有名气的哲学教授,非常欣赏人大附中的一个女学生,就对她讲要去念哲学。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女孩子哭哭啼啼跑到他家里面,她说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考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你以为我只可以念哲学吗。这样的事情太糟糕了,说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完全扭曲了。

王杰:哲学的衰落其实就是文化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衰落。我来交大后,重建了哲学系,但一直生源不好。我们现在想在本科教学层面作些改革,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话,我想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问题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我希望在杜先生的支持下,把这件工作做起来,认真做好。

(何信玉整理)

(责任编辑:张曦)

A 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with a View toward the Future

Du Weiming & Wang Jie

Abstract: The 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s important, significant and time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profoundly meaningful in cultivating a sense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at is open, pluralistic, and self-reflexiv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humanist vision is auspicious for Cultural China, the Confucian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critical spirit in Marxist social praxis and the sense of "concerned and tragic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thought can enter into a fruitful interaction. It can become a positive force and an enabling power to cultivate a form of spiritual humanism (a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secular human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of the modern West), a humanism that can fos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culture of peace for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Marxism, Confucian, humanism, future